

艾尔巴乔夫 雷日科夫 梅德韦杰夫 卢基扬诺夫 谢瓦尔德纳泽 克拉夫丘克 舒什克维奇 亚佐夫
普罗科菲耶夫 阿法纳西耶夫 尼·伊万诺夫 捷·格德良 德罗兹多夫 阿巴尔金 尼基塔·克拉斯尼科夫
乌特金 叶·巴扎诺夫 鲍·杜宾 亚·舍维亚金 沙赫赖 波波夫 奥斯特罗夫斯基



КРАХ КПСС И РАЗВАЛ СССР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ЕВ

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 主编 张树华 等 / 译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51

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КРАХ КПСС И РАЗВАЛ СССР.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Е

李慎明 / 主编 张树华 等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李慎明主编；
张树华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3366 - 0

I. ①亲…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苏联解体 - 研究
IV. ①D751.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562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51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主 编 / 李慎明
译 者 / 张树华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宋建勋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8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366 - 0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51

| | |
|-----------------------------|----|
| 编撰说明 | 1 |
| 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 | 1 |
| 戈尔巴乔夫：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 6 |
| 利加乔夫：有两种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 | 14 |
| 雷日科夫：政治斗争打乱了经济改革部署 | 22 |
| 梅德韦杰夫：党不应管理国家 | 30 |
| 梅德韦杰夫：对改革的抵制在党和国家管理机关内部已经成熟 | 33 |
| 卢基扬诺夫：“8·19”事件是挽救苏联的绝望一搏 | 37 |
| 谢瓦尔德纳泽：我和戈尔巴乔夫商量好要抛弃民主德国 | 47 |
| 谢瓦尔德纳泽：苏联领导人曾竭力摧毁苏联 | 52 |
| 克拉夫丘克：我宁愿砍掉自己的手，也不签署瓦解苏联的协议 | 58 |
| 舒什克维奇：我什么也不后悔 | 65 |
| 亚佐夫：苏联是被里应外合地摧毁的 | 72 |
| 亚佐夫：戈尔巴乔夫早就背叛了苏联？ | 78 |

| | |
|--|-----|
| 普罗科菲耶夫：苏联解体：谁之罪？ | 84 |
| 阿法纳西耶夫：我们欺骗了自己 | 90 |
| 尼·伊万诺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反腐败 | 94 |
| 捷·格德良：改革就是浑水摸鱼 | 100 |
| 德罗兹多夫：苏联领导层中曾有国外奸细 | 105 |
| 阿巴尔金：苏共应当一分为二 | 111 |
| 尼基塔·克拉斯尼科夫：西方用经济手段摧毁苏联 | 116 |
| 乌特金：苏联的投降与败退 | 121 |
| 叶·巴扎诺夫：为什么苏联走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 | 192 |
| 鲍·杜宾：无望的复兴 | 195 |
| 亚·舍维亚金：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投机与蜕变 | 200 |
| 沙赫赖：苏联解体的神话与事实 | 209 |
| 波波夫：联合起来，共同打败苏共 | 220 |
|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场悲剧还是 伟大变革？ | 229 |
| 奥斯特罗夫斯基：谁让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 | 237 |
|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戈尔巴乔夫漫长可怜的晚年生活 | 247 |
| 俄新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命运 | 251 |
| 特稿一 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解体和苏共败亡？ | 254 |
| 特稿二 苏共败亡的过程、原因与教训 | 269 |
| 附录 俄罗斯最新出版的与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有关的文献 | 284 |
| 再版后记 | 295 |

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 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

编者按：“8·19”事件2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的采访。戈尔巴乔夫向英国报纸表示，他早在1991年4月就该辞职，并成立一个民主政党推行“改革”，这是他最为后悔的事。第二件后悔的事是没有早些开始“改革”苏联，并赋予加盟共和国更多权力。而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便是“改革”。

英国《卫报》原编者提要：在《卫报》的独家专访中，原苏联总统回忆了他在20年前苏联的覆灭中扮演的角色。

原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他应该在1991年政变前几个月就离开共产党。

政客们很少承认自己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总是与众不同。因此，当他回首自己作为苏联领袖执掌权力的六个混沌年头时，能欣然承认自己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在《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罗列出自己至少犯了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导致他本人20年前的下台，也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还引入了未加监管的自由经济，使少数俄罗斯人成为亿万富翁，而千百万人民却陷入贫困。

近来戈尔巴乔夫总是表现得很轻松、很高兴，但他的内心偶尔也会有刺痛，尤其是在讨论起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或是描述20年前政变夭折时在

* 原文标题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记者为乔纳森·斯蒂尔，原载2011年8月16日英国《卫报》。

他克里米亚半岛的家里软禁他的阴谋策划者的时候。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让我和他们打架，甚至和他们枪战，以结束我的生命。”

当被问及最后悔的事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是我在试图改革共产党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他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职，并且建立一个民主改革党，因为共产党人阻碍所有必要的改革。

这个观点让历史学家们饶有兴趣，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应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前几个月就退出共产党。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没有谈及这一点。

到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深陷两股强大的势力当中，活动余地大大缩减。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企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进步派”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几位发言者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重启审查制度。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当时的他反应激烈：“这样煽风点火的行径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在《卫报》的独家访谈中，他解释了当时的细节：“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召开了一个三小时的会议，我不在场。我听说他们在会上对我进行批评，讨论得滔滔不绝。三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到会场，让我打消辞职的念头。其间，中央委员会里我的支持者们打开一个名单，有一百多个人签名倡导建立新政党。”

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时，形势有所缓和。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辞呈，没人想为这事举办一次投票（因为即使他真的从党内离开，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有益，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放弃党’。”自1917年起共产党就一直统治着俄罗斯；而那时，对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对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里都担任苏共党内职务的官员而言，很难想象让共产党放弃权力。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虑已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尽管当时苏共推行了改革，但它自身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粉饰外表已经足够了。然而事实是机构内部仍然是一团糟。”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是没有尽早对苏联进行改造并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1991年初正当他打算建立一个更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

海沿岸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频繁发生。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任何改变都势必导致日益剧烈的、无法阻挡的转变。按照这一分析，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观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 1999 年因白血病去世）有一定的关系。丧失控制权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 1991 年 8 月的政变将权力纷争扭向了新局面。

苏共原定于 1991 年 11 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抵抗危机”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 12 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这一条约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让苏联政府负责国防与外交事宜。条约原定于 8 月 20 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如果没有这 10 天假，我可能就大功告成了……我已经做好准备飞往莫斯科签订条约了。”戈尔巴乔夫说：“然而 8 月 18 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谁派遣，但电话不通。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福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政变土崩瓦解。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的内部分化，以及十几位由部长和苏共高官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成员不和，导致了政变的失败。

有人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强烈反对：“人们信口开河，声称我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联系，而且正是我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认为自己最终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一派胡言！”他说：“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求我写一篇声明，请求以身体欠佳为由而放弃总统一职。”

被软禁期间，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虚张声势。“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只是想给他们施压，但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的极端手段，不过是外交

和政治上的策略。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运动，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信任，并将信任亲自交付给他。他做得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英国《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觉得政变将获得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抢夺赫鲁晓夫的权力，并使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我问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戈尔巴乔夫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陷入混乱。他还指出，当特种部队被派去攻击联邦政府大楼白宫时，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特种部队发生了兵变。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perestroika，俄语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在核裁军的基础上调整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立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结束冷战、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不顾一切地推动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的渐进过程，等等。”

戈尔巴乔夫从未认同叶利钦的九年统治。他认为，这九年是一个充满混乱的时期。他对叶利钦在1991年12月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达成的宣布苏联解体的协定也不认同。他本应在叶利钦成为自己的直接对手好几年的时候就把他处理掉。他说：“对于叶利钦，我可能是太开明和太民主了。我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去当大使。”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取消了单议席选区。有20条改革我不认同。”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个长度为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我询问了他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对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前瞻，确信中国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学习中国进行改革的建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这么干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人民遭到了忽视，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我们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就不能将人民排除在外。”

“你认为中国人民最终能够避免在某个时刻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吗？未来某一天，中国人民将不得不在政治变革面前抉择，他们离这一天不远了。”

201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过的西方乐队。

然而，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知道他居然有这样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笑了起来：“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马秀钰译)

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 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后悔没有及时对苏共进行“改革”*

译者按：2010年4~5月，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① 25周年之际，俄罗斯报刊先后采访了当年“改革”浪潮中的一些当事人，回忆“改革”的台前幕后，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这些“改革”当事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瓦·梅德韦杰夫、波波夫、亚佐夫、切尔尼亚耶夫等。此文是戈尔巴乔夫接受《独立报》主编列姆楚科夫采访时的谈话，全文翻译。

列姆楚科夫：最近，我重读有关改革的著作时，把什梅廖夫（Н. П. Шмелев）、谢柳宁（В. И. Селюнин）、利西奇金（В. А. Лисичкин）、切尔尼琴科（Ю. Д. Черниченко）等人所写的文章都找了出來。

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我都认识，还有当年聚集在《新世界》、《旗帜》等杂志周围的那些人，正是他们形成了变革的舆论氛围，提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也包括扎斯拉夫斯卡娅（Т. И. Заславская）……

列姆楚科夫：是的，塔吉娅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她是位社会学家。

* 本文为俄罗斯《独立报》对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谈录，译自2010年4月6日俄罗斯《独立报·政治专刊》，原文标题为《戈尔巴乔夫：我不推卸责任》。

① 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实际上含有“改造、改建、重建”等意思，与通常使用的“改革”（реформа）不同。戈尔巴乔夫1986年4月在一次外出讲话中第一次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后来“改造”与“公开性、新思维”等词语成了戈尔巴乔夫自造和专属的政治名词。在英语、德语等文献中，“改造、公开性”等俄语词一般采用音译标注。20年来，国内习惯将其翻译成“改革”。为便于阅读，这里也只好沿用这种译法，但提请读者注意其特异性。

他们的文章很有意义，指明了当时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在读完这 30 多篇文章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所有的言论可以归结为“寻找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您并没有用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概念来想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您那句“我忠于我爷爷的信念”的话很有名。

戈尔巴乔夫：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

当年在苏联企业里曾流行过一种“肖金诺经营法”。这是肖金诺联合化工厂实行的一种经营模式。这还牵扯不到所有制形式，只是一种承包关系。但回想一下，这种方法的效果有多大？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劳动、劳动成果和劳动质量的兴趣。

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时，非常支持当时苏联有名的、最大型的化工企业之一——“涅维诺梅斯基”化工厂——采用这种经营方法。

工业中采用“肖金诺经营法”，配合农业中的奖金制度，加上“柯西金改革”^①——这些都是对经营管理方式的探索。这些举措唤起了人们对经营的热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责任感，并且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列姆楚科夫：是啊，那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一会儿是承包制，一会儿又尝试建立正规的合作社制度。我想问，为什么您最终没有采纳私有制呢？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通往私有制的道路艰难而漫长，而我们采用的那些过渡形式恰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顺便提一下，改革初期那些承包者，虽然其中不少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得到社会的认可却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这里就跟炸了锅似的。

不只是民众对那些农场主、承包人和合作社开办人充满了嫉妒，得了“红眼病”，就连国家机关也敌视这些革新活动。

^①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年4月苏共23大之后，主席团改称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出“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推行“新经济体制”曾经使苏联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之后这些措施逐渐淡出。

开展承包工程活动的先锋人物（胡加科夫），后来进了监狱。“肖金诺经营法”被人想尽办法扼杀了。这其中，化工部部长真是功不可没。我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尽力保护了那些进行探索的先行者。这些优秀的先行者常常陷入困境。比如想要整修养殖场和厂房，因为这是计划外的项目，不仅找不到建筑队和贷款，连道义上的支持都没有。他们只好到黑市上去搞建材，因此不免最后被列入违法乱纪之列。我不得不出面保护这些人。多么荒谬啊，那些优秀的先行者变成了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迫害的对象！

列姆楚科夫：一种制度出于自卫常常自相矛盾。不了解这个制度的力量的人，难以想象，我们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势下寻找出路，以摆脱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困局的。

戈尔巴乔夫：我讲讲安德罗波夫时期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将提议，由我在列宁的诞辰纪念大会上作报告。顺便说一下，以前都是由安德罗波夫亲自作报告。于是我极力想搞清楚，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也就是当建设一种新制度——社会主义——提到日程之时，列宁最关心什么问题。

我首先仔细地研究，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就这个问题的讲话很多，有时甚至重复过两三遍。我通过深入研读和思考列宁的言论，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您还记得吗，列宁起先说，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行为，然后又说，这项政策是严肃的和长期的。事实上，他把新经济政策看成了建设新制度的方法^①。

最让我吃惊的是——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们走

① 为此，我们特意查阅了列宁的原话。列宁在1921年10月14日《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通过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

我们还查阅了那一时期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可以看出，列宁一方面在向全党同志解释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局势所迫，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不得已的“退却”，是“迂回的措施”，目的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中指出：“……不仅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于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列宁接着强调，之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1921年6月（转下页注）

的路不对，由此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还提出了下列观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不是靠热情和主动，而是借助主动和热情，依靠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允许发展私人贸易，成立了租让形式的企业，等等，这样到了1926年，经济发展就得以恢复到了1913年的水平。

列姆楚科夫：喀琅施塔得叛乱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

戈尔巴乔夫：还有坦波夫州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事实上，列宁的思想成了我起草列宁诞辰纪念报告的关键。

应该说，正是这些思想使我现在依然维护列宁，并承认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思考列宁后期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他制定的政策及其对现代政治的重大意义。这已经成了我在思索改革的宗旨和发展道路等问题时的座右铭。

我想说，发动改革前，还在准备阶段，领导层决定要在全国恢复合作化运动。合作化政策不仅仅局限在农业部门，还有工业领域。但后来有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认为工业领域的合作化会扩大私有权。

我们发展农业的潜力巨大。应该利用包括扶持农场经济在内的所有手段。但我倾向于在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这并不排斥吸引大资本和利用高新技术建立私人企业。我特别关注一项调研成果，这是俄方和西方专家共同开展的有关我国农业发展潜力的调研。结果显示，以俄罗斯联邦现有的耕地面

（接上页注①）13日]一文中，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绝不是投降，而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赛”和“殊死斗争”。在《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921年10月29日）一文中，列宁鲜明地指出：“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其间，列宁还批评了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文人气”、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对于当时“路标转换派”把“新经济政策看成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说法，列宁予以严词批驳。

可见，在此，号称“列宁的学生”的戈尔巴乔夫在断章取义，片面理解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和思想。列宁始终强调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追求，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一文中指出：“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越自觉，越协调，成见越少，那么，我们就会越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越有把握，越迅速，越波澜壮阔。”——编者注

积，如果采用新的农艺和育种等先进科技，我们完全可以养活 8 亿 ~ 10 亿人。这可是我们今后多少年的财富来源。我们现在应当把资金往这里投。

其实在苏联政权最后那几年，这样的做法已经出现了。举一个例子。为实施粮食纲要，我们在 3500 万公顷麦田采用了英国小麦种植技术。第一年这些地里的平均产量就比别的地多出了 1 吨。人们迅速接受了这种技术。现在人们还了解这个。除了采用类似的技术外，我认为，应当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当然，我已经远离这些事了。

列姆楚科夫：我很能理解您的怀旧情绪，这 20 年里您经常提到这一点。可是很多人认为您在推行改革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我们当时应该走中国式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我对待变革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人有自己保守的一面。是的，我们从“加速”、从经济入手，探索如何提高物质刺激。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引进最先进的工艺，为的是提高效益。

列姆楚科夫：但结果却是短缺，而中国却没有短缺，而是国内外市场的充裕。你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戈尔巴乔夫：说到短缺经济，这可真是一言难尽。短缺实质上是我国经济制度的问题。这是首要的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才从科技进步着手。我们当时把大量资金投向了机器制造业，就是想借此促进整个经济的全面提升。这其中也包括农业。也许，应当走得慢一些，多积累些经验，用成功的例子来说服人，让他们认识到必须进行结构改革，必须对整个经济来一场技术和经济的更新换代。

短缺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犹如如影随形的诅咒。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一个在 20 世纪下半叶成为工业强国的国度，却无法满足本国居民最普通、最必需的物质需求。

首要原因在于体制和经济制度本身缺乏效率。其次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应当讲明白，为的是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在军备竞赛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我们为军备竞赛耗费了 10 万亿卢布。美国也花了相同的钱。但是美国承受这笔费用绝不像我们那样艰难，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正需要现代化改造。

改革的最后一年，就在我们实施粮食纲要，准备解决短缺问题，为居民提供可靠的食物供应的最后关头，发生的事毁掉了我们的发展计划。当然，有人也会说，粮食纲要是无果而终的。

许多事情都与军备竞赛有关，军费在持续增长，而国内经济尤其是农业

却陷入了困境。美国一直不满苏联领导层的所作所为。1986年，美国让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在国际市场上尽可能地抛售大量的石油。这样一来，我们每桶石油只能换取10美元（想想现在我们的石油收入是什么情况？），我们减少了2/3的外汇收入。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国家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还有一个原因是反酗酒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在讲那时怎么作出决议、压缩烈性酒生产和全面整顿经济部门之前，我必须先说说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这些年，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引起了某些反应，而大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我头上。好吧，这里我并不急于为自己开脱。但这段历史确实要从勃列日涅夫说起，起先他非常反对酗酒，但后来在来自社会和政治局的压力下妥协了。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就开始酝酿成型了。等计划制订出来，全社会都知道了这回事，正好轮到我们来付诸实施。我们就这样陷进去了。所有这些给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粮食纲要还是取得了成绩。“十二五”期间，粮食生产实现了增长：粮食年均产量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2660万吨。牲畜肉产量增加了250万吨，奶产量增加了1000多万吨。经营亏损企业的数量从25000家下降到4000家，不到10%。

列姆楚科夫：我对您的回答还是不太满意。您是怎么导致1990~1991年那种全面短缺的局面的？

戈尔巴乔夫：我刚才讲的东西中还应该加上一点，这就是：在经济矛盾不断深化的同时，国家的财政也出现严重困难。我们在五个国民经济部门进行了经济核算的实验，之后我们决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推行经济核算。

财政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的争论越来越尖锐。在此情况下，我与政府总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就此专门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办？我们是修正经济政策、修正‘十二五’指标和预算，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政策？财政状况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只怕会产生更大的危险。”这是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次谈话。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刚通过了提高教师、科技文化工作者工资的决议和退休奖励法案。这需要450亿卢布的资金。工业、建筑、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工资已经涨过了。在此之前，商品缺口已达到500亿卢布，而上述决策实施后，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000亿。我们的国民经济完全不堪重负，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

当然，我们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来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我们可以向境外

购买商品，但国家已经没有外汇了。我们只能动用黄金储备，这也没能奏效。

如今我想，我们原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减轻商品供应不足的压力。不管有多么困难和危险（这已经是公开性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向人民说明情况的复杂性。或者推迟两到三年再实施退休法，或者从军费中抽出150亿~200亿卢布用于购买商品。但我们没敢这样做。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我。我应该有所决断。

但是，对当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我们来说，那样的事简直不可想象。

现在我的想法是：那又有什么呢？即便是失掉权力，我们至少也能避免一场灾难。我们认识到了，但决心不够。我们的反对派——主要是党内的官僚集团——对政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1989年选举期间他们更是变本加厉。至于1989~1990年诞生的新俄罗斯联邦政府，正是他们导致了苏共中央分裂和1991年8月改革反对派闹事反击的局面。这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为叶利钦夺权创造了条件。叶利钦的行为是一种叛变，他从背后下了黑手。其实这个时候，各项旨在摆脱危机的措施已准备就绪，反危机计划和联盟条约新草案也已拟好，而新草案还有叶利钦的亲手签字。

列姆楚科夫：对您个人来说改革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评价改革？

戈尔巴乔夫：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伸手讨要过一份工作。但常常是我恰好处于事件的中心。这也体现在我的政治仕途上。15年间，我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的一个处长做起，先后担任团委书记、市党委书记，直到边疆区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您会觉得，我提升的速度很快吧。我为斯塔夫罗波尔办了不少好事。最主要的事情有：让工业发展步入新的轨道，引进高效技术，实行农业专业化和集约化，改造城市和度假设施，扶持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量建设工厂——这是遵照苏共23大关于发展中小城市的决议进行的。这些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学校。我把在这里开展的活动称为“小改革”。

后来，三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接连病逝这段时期，我正好进到了苏联领导层——在费·达·库拉科夫^①去世之后。因此，我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曾共过事。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生前就要提拔我。他逝世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病中的安德罗波夫曾

^① 费·达·库拉科夫（1918~1978年），苏共和苏联领导人。曾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共负责农业问题的领导人。1978年库拉科夫由于心脏病突发逝世后，同样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戈尔巴乔夫接任其职权。